

## 「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國」研習側記

演講者：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准教授村上衛

演講時、地：2016/8/19，中研院近史所

撰稿者：中山女高／莊佩翎老師

晚清中國沿海貿易的實際狀況如何？沿海地區的人民如何活動？而英國在近代中國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？清朝政府又如何處理沿海貿易的各項事務？本次演講由村上教授抽取著作《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國：福建人的活動與英國、清朝的因應》的研究內容，通過描述福建人的活動，從地區性的個案，看到中國與列強「互動」，打破以往強調中國「被動」的觀點。在「海洋史」、「經濟史」、「社會史」的背景下，說明 19 世紀 30 年代至 20 世紀初華南沿海的鴉片貿易、通商口岸、海盜、船難、祕密會社的關係。

研究回顧的部分，在海洋史方面，前近代史與近代史中間卻有著斷層，因為清朝是起源於北方的大陸地國，而 17 到 18 世紀的日本、朝鮮、琉球等東亞國家採取封閉的政策，直到 19 世紀後海域在東亞地區的重要性才開始提高，因此中文資料較少。經濟史方面，過去大多針對 1860 年代以後的通商口岸，因為能使用海關統計資料做為研究對象，因此對於開港前及 19 世紀通商口岸體制形成期的討論很少，而研究也以江南地區為主，並以此代表「中國」。社會史方面，則注重城市社會史、社會秩序維持的方向。

本書以閩南地區為重心，因為此地具有長期且廣泛的對外關係，研究以福建民眾在閩南地區引起各種糾紛為線索，探討社會如何維持安定。從中國的角度來看，既然中國未殖民地化，那麼歐美和中國都有「主體性」的一面和「被動性」的一面，本書將探討駐華英國領事扮演的角色，目的在由微觀的角度重新檢視英國在中國近代史上的位置。

接著從每個章節簡要說明書籍內容。第一部「清朝沿海秩序的崩解——開港之前」包含第 1~2 章。第 1 章「閩粵沿海人民的活動與清朝——以鴉片戰爭前夕的鴉片貿易活動為中心」，鴉片戰爭前，福建、廣東沿海民眾的鴉片貿易遍及整個沿海地區，本來清朝依賴「牙行」實行貿易管理，但牙行體制卻無法處理像鴉片那樣無法課稅的走私品問題，而官方對鴉片的查緝更導致鴉片交易的零散化，原本鴉片下船後還會透過牙行轉賣到洋貨鋪、再到當地商人手上，後來卻不再經由牙行，而是直接船隻賣入洋貨鋪。第 2 章「清朝與漢奸——以鴉片戰爭時期的福建、廣東沿海民眾對策為中心」，鴉片戰爭後，清朝將接連的敗北歸咎於那些與外國接觸的「漢奸」，開始對漢奸進行鬥爭，採取組織團練、鄉勇和港口封鎖

等舊方法對付「漢奸」，清朝對沿海地區的統治開始崩潰。

第二部「十九世紀中葉華南沿海秩序的重建」包含第 3~6 章。第 3 章「閩粵海盜與英國海軍——19 世紀中葉福建沿海的海盜問題」，沿海地區通商口岸的貿易擴大，受到打擊的廣東人、福建人變成海盜，清朝水師無法處理的情況下，官員以英國領事為中介人，利用英國海軍鎮壓海盜。第 4 章「遇難的『夷狄』——19 世紀後期華南船難對策的變化」，英國海軍功能有限，如果外國人在東亞遇到船難，清朝對生還者的遣返並未將財產和生命的保護納入考量，這些外國人必須依靠海關，使海關的建設變得非常重要。第 5 章「祕密結社與華人——五口通商時期廈門的華人與小刀會之亂」，此時，還有另外一種人也會介入沿海貿易，這些過去已移居東南亞的華人，這些華人以東南亞屬於英國殖民地為由主張自己是英國臣民，他們因為擁有外國人特權，而與閩、粵當地官民的關係惡化，為了保護自己，英籍華人組織小刀會，當清朝鎮壓沿海地區後，小刀會的殘餘勢力也因此轉移到東南亞，東南亞的福建人勢力也逐漸擴大。第 6 章「綁架者與被綁架者——19 世紀中葉廈門苦力貿易的興衰」，苦力貿易起源於歐洲各國相繼廢除奴隸貿易，但許多地方確有勞動力需求，許多閩南地區的人民便主動、或被誘拐，往東南亞以外的地方（如美洲、澳洲）移民。

第三部「世紀之交貿易的變動與華人的作為」包含第 7~9 章。第 7 章「亞洲內競爭的敗者——清末廈門貿易結構的變化」，19 世紀後期，出現以廈門為中心由閩南和臺灣構成的經濟圈，並連接中國沿海，但 19 世紀後期，產地間競爭激烈化導致閩南產品自廈門出口衰退，且日本領有臺灣也使臺灣脫離廈門的經濟圈，最後使廈門經濟圈只能通過華僑匯款維持。第 8 章「善堂與鴉片——19 世紀後期廈門的鴉片課稅問題」，外國鴉片稅由商人包攬進行，稅收是地方政府的經費，《煙台條約續增專條》生效後改由海關負責，清朝地方官員通過鴉片捐想恢復稅收，但外國鴉片貿易的衰退和中國商人的反對，使徵稅失敗。第 9 章「被利用的『帝國』——晚清廈門的英籍華人問題」，1860 年代後，英籍華人成為清朝和英國雙方提防的對象，地方官員抑制英籍華人的經濟活動，但這卻妨礙廈門貿易的發展。

經過 16、17 世紀，華南沿海形成「牙行」的貿易管理體制，讓中間人管理貿易、進行徵稅。直到 18 世紀此時世界性貿易擴張，因應世界性的變動，在中國，廣州對歐美的貿易大幅擴張，使廈門、廣州既有的貿易管理體制產生動搖。歐美私商與福建、廣東沿海的無數民眾互相連結、發展，造成既有體制瓦解，影響清朝日後對鴉片的查抄措施。換言之，鴉片戰爭並非近代之始，而是產生變動的一個結果。開港後，沿海因為走私、苦力貿易、海盜猖獗，秩序極為混亂，無數的福建、廣東人從事零散活動，造成既有貿易體制完全瓦解。海關和近代海軍等以西方「制度」為基礎的體制，比中國既有的制度更容易管理沿海貿易、維持

治安穩定。

因此在管理上，19 世紀中葉清朝一面利用歐美諸國的人員進行秩序重建，引入歐美制度，使中國沿海地區較內陸更早克服 19 世紀中葉的混亂。結果，清朝地方官將掃蕩海盜、徵收關稅、管理移民等業務，委託給外國政府和外國人，常常被視為以英國為主的歐美列強「強制」施加政策給中國，但事實上，外國並不是在「利用」中國，而是在「被利用」的狀態，外國人成為中國政府的代理執行人，因為對清朝來說，相較於讓成本高而且可能發生各種糾紛的中國人承包，將事務委託給外國人更可靠。